心理科学进展 2018, Vol. 26, No. 3, 538–548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8.00538

为人父母者更幸福？*

徐华春 崔碧颖 张文婷
(四川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与心理学院, 成都 610068)

摘 要 生育−幸福的关系是一个影响个人、家庭和整个社会的重要话题。目前, 它已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涉及到人性需要、心理发展以及现实的社会环境等诸多影响因素。对此, 全世界大众中存在一些广泛的素人理论与信念, 心理学家则基于不同理论阐述了生育的心理功能以及生育−幸福的关系。已有的实证研究仍以人口学调查为主, 结论却不尽一致。复杂调节变量的影响, 研究者对幸福的不同界定与测量以及社会的变迁都可能导致生育−幸福关系的复杂性。未来研究者应在人性哲学的探讨、充分考虑群体异质性的深入调查、基于心理学视角的实证研究以及相关问题上心理健康服务的研究与实践方面作出更多工作, 并为国家有关政策的改革提供建议。

关键词 为人父母; 幸福; 快乐; 生活满意度; 意义感
分类号 B849: C91

为人父母者都了解, 孩子可以带来最大的快乐与满足, 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辛劳与付出。从整个生命历程来看, 生儿育女又是人生中一项极具挑战性且影响深远的重要生活事件。现代人在面对这一问题时, 则已从传统经济层面上的“养儿防老”观念转而更重视其心理意义。事实上, 为人父母者的幸福状况也远不只关乎他们自身, 它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和决定大多数家庭的和谐稳定以及每个子女的健康成长。人们在此方面的预期与实际结果也将直接影响其在生育与否以及生育子女数量等问题上的决策。因此, 社会大众以及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乃至经济学家都关心一个问题: 生儿育女究竟与个人幸福是怎样的关系?

在我国,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目前正进入调整和转向阶段以应对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社会问题。以往在相关问题上的研究也更多以人口学的视角来进行。而当前, 基于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证, 统合个体、家庭与社会等诸方面来理解生育−幸福等相关问题已成为趋势。

收稿日期: 2017-03-27
*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MZ044)。
通信作者: 徐华春, E-mail: seanxu1981@163.com

本文将对该方向上已有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进行梳理和总结, 以便于未来进行立足于我国文化与现实的实证研究。

1 大众信念

首先, 关于生儿育女与人生幸福的关系, 大众中广泛存在一些朴素的观点与信念。它们为人们提供先入为主的看法和行为指导, 同时又可能作为舆论和社会期待直接影响为人父母者以及无子女者的幸福水平。Hansen (2012)总结了三种相关的大众信念, 同时也强调这些信念存在不同程度的地域和族群差异, 并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改变。

信念 1: 有孩子让人更快乐。生儿育女被广泛认可为个人获得圆满和幸福人生的重要经历。拥有孩子的倾向是强烈而内隐的, 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年轻人(90%~95%)都计划未来拥有孩子。尽管主动选择不要孩子的人在一些西方国家有所上升, 但其比率仍然很低, 仅为 2%~6%; 绝大多数无子女者是因为结婚或生育计划的一再推迟而被动形成的。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广泛信念是: 孩子促进婚姻的圆满。比较而言, 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少认同这一说法。信念 2: 没有孩子是凄凉的。普遍的观点认为没有孩子的成年人生

活空虚, 尤其是在老去以后。在东欧及很多非西方国家, 这一比例达到了 55%~70%, 但在荷兰、美国发达国家, 仅有 10%~25%的人认同这一点。信念 3：无子女者是自私的享乐主义者。尤其是为人父母者常常会将那些不要孩子的人视为不成熟的、自我中心的人, 认为他们只专注于工作、休闲娱乐和浪漫关系, 而逃避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 也有人开始用“无孩自由族”等中性或偏积极的词汇来称呼无子女者。

2　心理学理论观点

心理学研究者分别从人的本性、个体发展、幸福的来源等不同视角对生育−幸福关系提出了各自的理论观点。总结起来, 这些观点可以分为三类, 即生育对幸福无持久影响, 生育对幸福有积极影响以及生育对幸福存在程度和方向上不确定的影响。

2.1　生育对幸福无持久影响

该观点又称为调定点理论, 认为一个人的幸福水平其实是稳定的; 个体不论经历怎样的生活事件, 其幸福水平总是会在生活事件发生后不长的时期内就会恢复到从前的基线水平(Headey, 2010)。从长远来看, 幸福仅取决于个体的人格特质和其它生理遗传因素。比如, 在大学期间表现出更多积极情绪的女性更可能在毕业几年后就结婚, 并在随后 30 年表现出更高的婚姻满意度, 更少经历婚姻问题或者离婚, 而最终离异或分居的人大多在婚前就不幸福(Lucas, 2007)。

就具体的生活事件而言, 已有研究证实, 丧偶、失业会显著且持久的降低个体生活满意度, 不符合调定点假设(Headey, 2010)。而在生儿育女方面, 已有的基于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纵向追踪数据的研究(Clark, Diener, Georgellis, & Lucas, 2008; Clark & Georgellis, 2013; Myrskylä & Margolis, 2014)均发现, 在第一个孩子诞生前后, 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水平会达到高峰, 但在孩子 2 岁前就会明显回落。但在不同的研究中, 回落后的幸福水平与怀孕前幸福水平的比较结果不一。

2.2　生育对幸福有积极影响

2.2.1　心理发展论

Erikson (1963)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儿育女的行为。众所周知, 他将人的毕生发展划分为 8 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面临特定的发展危机, 需要解决相应的核心任务。当核心任务得到恰当的解决, 个体就会获得完整的同一性。其中, 个体在第七个阶段成年期所面对的就是繁衍对自我专注的冲突。他认为, 如果个体顺利地度过了前面几个发展阶段, 成年人在此阶段会自然的生儿育女, 关心后代的繁衍和养育。生育感可区分为生和育两层含义：没有生孩子的人也可以通过关心, 教育和指导下一代获得生育感。相反, 前期自我同一性发展的不完善可能形成没有生育感的人, 其人格发展将出现停滞, 表现为只考虑自己, 不关心他人。这也将带来个体在人生最后阶段的绝望感。由此观点来看, 生儿育女是个体心理发展中必要的或者至少需要去替代性弥补的经历, 其对个体后半段人生的健康、幸福的影响不言而喻。

2.2.2　进化心理学的观点

以 Kenrick 为代表的进化心理学家将生儿育女视为人类基本需要。他们将生儿育女置于人性需要金字塔结构的顶端, 认为它不是低级的生理需要, 而是高于即时生理需要、自我保护、人际关系、自尊、配偶寻求以及配偶维持等需要的最高级需要(Kenrick, Griskevicius, Neuberg, & Schaller, 2010; Kenrick & Griskevicius, 2015)。人类与动物一样, 其所有心理与行为的终极功能是成功繁衍。人类诸多行为, 包括艺术创作、慈善行为以及致力于改善后代的未来环境等积极行为都是由这一本能的无意识目标所催发的。只是人类对此缺乏了解。与人本主义观点不同, 进化论认为所谓积极高尚的行为只是在追求终极繁衍目标时带来的“副产品”, 也只有在进化论观点基础上充分认识人的本性, 才能真正促进积极心理学的发展。

当然, 进化注重的是基因遗传率的最大化, 而不是个体幸福。而从适应的角度来说, 基本需要的满足自然会带来奖励性或心理愉悦性的结果。但需要注意的是, 对需要满足的追求过程和需要的满足状态是两回事, 很多与养育孩子相关的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奖赏性质。生儿育女的心理收益可能要直到该目标全部完成——即将孩子抚养成人——之后才能完全获得(Schaller, Neuberg, Griskevicius, & Kenrick, 2010)。其次, 该理论也强调低级需要的优先地位。如果低级需要(如温饱、安全)无法满足的话, 作为高级需要的生儿育女是不会带来快乐的。况且, 养育孩子是可能影响到低级需要(如安全、人际关系、配偶维持等)的满足

的，其过程有可能对个人幸福带来消极影响(Nelson, Kushlev, & Lyubomirsky, 2014)。

2.2.3　恐惧管理理论

恐惧管理理论认为，相比于动物，人类独有的高级意识功能使得我们知晓自己终将死亡，并随之产生深深的恐惧。死亡恐惧是人类动机的核心源泉，坚持自己的文化世界观和维持自尊则是两个基本的恐惧管理机制。而具体的实证研究则犹以死亡凸显效应的研究为盛(陆可心，沈可汗，李虹, 2017)。已有研究发现，孩子是缓解个体死亡焦虑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死亡凸显下，个体的生育意愿更强，也更关心家族中的年幼者(Zhou, Liu, Chen, & Yu, 2008)。但这种效应并不仅限于自己的后代，广泛意义上后代的概念甚至新生动物的照片都能起到这样的效果(Zhou, Lei, Marley, & Chen, 2009)。Zhou 等人(2008)认为，一方面，亲生子女本身就意味着自己生命在某种形式上的延续，而在符号意义上，婴儿或后代也代表着死的反义词——生和延续。另一方面，孩子也可以通过传递个人的文化世界观和提高其在社会上的认同和自尊来缓解死亡焦虑。总而言之，在该观点看来，生儿育女的行为以及对孩子和新生命的广泛关注是人类应对死亡焦虑的有效防御。

但也有研究发现这种效应可能存在文化差异。比如，对于荷兰女性被试而言，死亡凸显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受到其事业心的调节作用影响。具体而言，对于事业心强的女性来说，只有当为人母与事业相和谐时，死亡凸显才会增强其生育意愿，否则反而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Wisman & Goldenberg, 2005)。但这一调节作用并没有在德国和中国女性中表现出来。

2.3　生育对幸福存在不确定的影响

2.3.1　比较理论

幸福的比较理论认为，幸福感来源于自己目前实际的生活状况与个体所认同的价值观与目标之间的比较。比较的标准包括他人、过去、理想中的状态、主观设定的目标等等。各种比较之后的结果又相互影响，最终决定其幸福水平。如果个体的现状达到或超过个体期待，就会产生幸福感(Plagnol & Easterlin, 2008; Easterlin, Morgan, Switek, & Wang, 2012)。

如前所述，就目前而言，生儿育女是被绝大部分人认可的生活目标。因此，为人父母本身就会带来社会认同感、自尊感以及生活满足感。同时，养育孩子的过程还为父母提供了其它非常有价值的目标去追求(如为孩子提供食物、居所、情感、监护和教育等) (Delle Fave & Massimini, 2004)，并帮助父母以更加宏观和深刻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生活的目的。该观点强调即时积极情绪与幸福的不同，认为只有个人达成目标后所获得的长期稳定的满足才能叫做幸福。但是，对于那些不将生儿育女作为生活目标的人来说，生儿育女的意义就另当别论了。

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就认为，社会的发展已经带来公众价值观的改变，人们越来越看重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其中，女性受教育程度以及工资薪酬的普遍提升被认为是主要原因。Aassve, Mencarini 和 Sironi (2015)则分析认为，更高的受教程度确实促使女性人生志向发生结构性改变，但女性生育意愿并没有降低，只是对职业生涯的成功有了更多期待，对平衡工作与家庭有了更多要求。总而言之，基于幸福的比较理论，生育的必要性以及生育-幸福关系可能会随着社会发展和大众观念的变化而变化。

2.3.2　自我决定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强调自主、关系和能力是人类三种基本心理需要(Deci & Ryan, 2008)，生儿育女并不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但该行为会以三种心理需要为中介显著而持久的影响个体的幸福。首先，关系需要方面，孩子为父母提供了持续的爱与亲近感的来源。尤其是，与孩子积极相处的母亲表现出总体上更多的快乐与愉悦。与此同时，与孩子的冲突则与父母总体上更低的幸福感相联系(Kiecolt, Blieszner, & Savla, 2011)。除此之外，生儿育女还为父母提供了进一步发展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和社区关系的机会。有研究表明，相对于无子女者，为人父母者表现出更好的与亲属、朋友和社区的社交融合(Nomaguchi & Milkie, 2003; Hartas, 2014)。其次，在自主需要方面，为人父母是个体迈向成年和独立的重要标志，同时也预示着个体开始可以管控自己的行为及结果。另一方面，生儿育女也将带来父母精力的消耗，休闲时间的减少，从而可能降低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自主感。能力需要方面，身为父母的效能感被证实非常显著的预测个体的家庭生活满意度(Bandura, Caprara, Barbaranelli, Regalia, & Scabini, 2011)。总

而言之, 该理论认为生儿育女作为一项重要的生活事件, 将以显著而又间接的方式影响个体幸福。

2.3.3 收益–代价的观点

很多家庭领域的研究者则综合各观点认为, 为人父母者从生儿育女中既获得了诸多益处, 也要付出各种代价, 二者之间的中和决定特定个体与家庭的生育–幸福的关系。随着社会发展进步, 现代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成年人并不重视也较少从子女那里获得经济性收益, 心理性收益的重要性更加凸显(Pollmann-Schult, 2014)。如前所述, 孩子可以满足父母的心理需要, 带来诸如欢快、逗趣、兴奋等直接的积极心理体验, 帮助父母新建或加深人际关系, 还有助于成年人以父母的身份增强社会认同。

生育代价则主要区分为三大类(Pollmann-Schult, 2014): (1)时间代价。生儿育女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用于照料孩子和做家务。为人父母者的休闲时间、睡眠时间以及夫妻二人相处的时间都可能随之大幅减少, 进而影响自身的健康与生活质量。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 这种时间成本显得更大(DeVoe & Pfeffer, 2011)。(2)情绪代价。较之于无子女者, 为人父母者总是对自己孩子的安全和健康问题过度担心, 从而更多感受到害怕、不安和担忧。而从进化论视角来看, 父母这种高度的警惕和担心状态是具有适应性的(Hahn-Holbrook, Holbrook, & Haselton, 2011)。另一方面, 为人父母者也会因为孩子对自己权威的挑战, 而更容易感受到愤怒, 也更多的感受到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冲突。(3)经济代价。它包括家庭开支的增加, 也包括父母一方辞职带孩子或减少工作时间所带来的家庭经济收入的减少。

在无子女者方面, 已有研究表明, 他(她)们表现出较高的且稳定的经济和休闲方面的满意度, 较少的担忧、压力以及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使用方面的灵活性(Keizer, Dykstra, & Poortman, 2010)。但从另一角度来讲, 适当的挑战、负担有助于个体的发展以及对稳定深刻幸福的获得, 责任方面的缺乏则可能带来“空虚的生活” (Karlsen, Dybdahl, & Vittersø, 2006)。现实中自愿放弃生育的人群比率其实很低, 这从侧面反映出, 对于大多数无子女者而言, 他们确实错失了一项重要人生目标的达成。最后, 无子女者也可以对自己无子女的状态产生适应。研究发现他(她)们在发展和深化替代性的社会关系方面富有创造性(Wenger, Dykstra, Melkas, & Knipscheer, 2007)。

3 直接的实证研究及总体结论

目前, 直接探讨生育–幸福关系的实证研究多为人口学调查, 也有少量研究基于心理学视角。主要研究途径包括跨群体比较研究、跨期追踪研究和育儿体验研究三种, 另有一些研究涉及到有关的生理机制。

3.1 跨群体比较研究

该取向的研究将父母与成年无子女者在总体幸福状态方面进行比较。但是, 相关的结论并不一致, 有的研究发现父母群体幸福感水平更低, 有的发现父母群体幸福水平更高, 也有的发现没有差异(Aassve, Goisis, & Sironi, 2012; Nelson, Kushlev, English, Dunn, & Lyubomirsky, 2013)。这些矛盾结果可能跟样本类型、幸福的测量指标与工具的差异性有很大关系。

一些基于全国性大样本的调查与比较(Nelson et al., 2013; 李婷, 范文婷, 2016)则显得更具价值。这些包含了各种年龄段、职业、收入、婚姻状况等的样本数据使得研究者从整个生命历程角度考虑生儿育女与幸福感关系, 以及对二者关系中的很多复杂调节变量的探究成为可能。缺点则在于, 这种大样本调查中对幸福感的考察通常只是基于某个单一题项而非信效度完善的完整量表。

3.2 跨期追踪研究

这种方法主要追踪考察为人父母者生育前后的幸福感变化, 相关研究结果也不尽一致。有研究结果表明初为父母者的幸福感在孩子出生前后短期内急剧上升, 但在随后的两年内回归到怀孕前的幸福水平(Dyrdal & Lucas, 2013)。也有研究表明为人父母者的生活满意度变化确实是先增后减, 但其积极情绪总体上是增加的(Luhmann, Hofmann, Eid, & Lucas, 2012)。也有研究得出结论, 初为父母者的喜悦极其短暂, 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压力和烦恼, 快乐程度和生活满意度再也不能恢复到先前水平了(Clark et al., 2008)。

Pollmann-Schult (2014)则在对德国大样本的跨期十几年的纵向调查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后发现, 在控制了生育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因素后, 生儿育女显示出对父母生活满意度显著而持久的积极影响作用。相对于调定点理论, 该结论支持收益–代

价的观点。进一步的分析还证实，对于父亲而言，这种积极效应主要受到了经济压力的抵消；母亲则同时受到时间代价和经济压力的影响。Lyubomirsky 和 Boehm (2010)则强调，孩子年幼时，父母付出的代价和成本确实很大，但从长远来看，尤其是考虑到老年以后，生儿育女的积极影响才是更加显著的。

但是，总体上而言，在这些研究中，对父母幸福基线的测量时间通常在生育前的 1 年左右，而随后的追踪期限则都在 5 年内，相比于父母对孩子将近 20 年的实际养育来说，已有研究的时间跨度无法完整说明生育与幸福的关系。由此得出的生育对父母幸福感的消极影响就可能被夸大(Nelson et al., 2014)。

3.3 育儿体验研究

该方法将育儿行为体验与其它日常活动中的体验进行比较。具体来说，研究者要求父母回顾一天的不同时间段正在做的事情，然后对各个时间段的情绪体验进行评价。有研究要求被试对各种活动就其积极体验程度进行排序，结果有的发现母亲仅将照顾孩子置于 16 种日常活动的第 12 位(Kahneman, Krueger, Schkade, Schwarz, & Stone, 2004)，有的研究则得出更积极的结果(Nelson et al., 2013)。Kushlev, Dunn 和 Ashton-James (2012)的心理实验则发现，金钱启动会降低父母陪伴孩子时的意义感，但对积极情绪的体验没有影响。

相比于前两种方法，该方法关注的是个体实际与孩子相处时的即时体验而不是对自己总体幸福感的反思和评估。也正因为如此，它不能说明为人父母者的整体幸福感状况，也无法与无子女者进行对比。

3.4 生理机制研究

有研究比较个体对婴儿面部与成人面部的加工机制发现，对两者的加工都能激活初级和高级的视觉区域神经活动，而对婴儿面部的加工能激活更多的脑部神经活动区域。使用 fMRI 和 NIRS (Minagawa-Kawai et al., 2009)的研究都发现，母亲看着婴儿的脸时，积极情绪增加并伴随眶额皮层(OFC)神经活动增强；而 OFC 神经活动的增强被认为与奖励处理机制相关。事实上，这种反应在父母与非父母群体中都普遍存在，生育行为的产物——婴儿能激活“养育脑”区域的神经活动，增加人们的愉悦度，提高人们的幸福感(Strathearn, Fonagy, Amico, & Montague, 2009；张茂杨，彭小凡，胡朝兵，张兴瑜, 2015)。

另有研究发现，婴儿的哭声会激活父母群体被试右侧杏仁核的活动，该神经活动与压力症状相关，如焦虑或强迫性的想法和行为(Kim, Strathearn, & Swain, 2016)，非父母群体则不会有相同的反应。高皮质醇激素水平的父母对婴儿的需要更加敏感，而皮质醇是唯一与认知的准确性相关以及对婴儿产生积极情绪的的激素(Parsons, Young, Murray, Stein, & Kringelbach, 2010)。

这些研究从生理层面描述了人类普遍会从生育中获得的复杂体验，而这些或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在进化论观点看来均具有适应性。当然，此类研究也无法触及人类的意义感、整体幸福感等概念。

3.5 复杂调节变量的影响

如前所述，各种研究范式都得出了不那么统一的结论。研究者也普遍认可，生育-幸福关系会受到多种调节变量的复杂影响，但具体的影响结果也不一致。Nelson 等人(2014) 主要基于西方的研究结论，梳理出比较统一的几个调节变量的影响：(1)父亲比无子女的男性更幸福(Keizer et al., 2010; Nelson et al., 2013)。(2)中年或老年的父母相对于无子女者同等幸福或更加幸福，年轻的父母相对于无子女者则幸福感较低(Nelson et al., 2013)；(3)子女年龄方面，孩子较小的父母幸福水平相比于无子女者更低，这种状况可能持续到孩子 5 岁左右(Clark et al., 2008); (4)家庭经济地位。生儿育女对家庭经济地位高的父母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高阶层父母较之于低阶层父母，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意义感和目的感更低(Kushlev et al., 2012)。这与高阶层父母更追求个体性目标，感受到更大的时间压力与机会成本有关(DeVoe & Pfeffer, 2011)。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比较容易理解的因素的影响，比如非婚父母、社会支持度较低的父母的幸福水平更低等。

国内人口学研究多关注子女的数量及性别因素的调节作用，结论也不一致。比如，王伟、景红桥和张鹏(2013)发现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孩子数量减少并没有降低其幸福感。穆峥和谢宇(2014)则发现，更多的孩子对父亲、母亲的自信心、生活满意度等各方面均有积极影响。王钦池(2015)发现，子女数量对幸福感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子女的性别结构和性别次序对父母幸福感均有影

响。李婷和范文婷(2016)则发现，更多的孩子对处于中青年时期的父母产生负面影响，却会显著提升父母在老年时期的幸福感。除此之外，对农村父母来说，生育儿子会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产生略微正向的幸福效应；但是对城市父母来说，生育儿子会显著降低其在中老年后的幸福感。

4 其它争议性问题

4.1 幸福的定义与测量

事实上，心理科学对其幸福结构的定性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徐晓波，孙超，汪凤炎，2017)。西方研究者普遍强调其广阔内涵，并使用幸福(well-being)、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和快乐(happiness)等相关概念。在具体的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对父母幸福的测量会各自围绕情绪体验(emotional experience)、主观快乐(subjective happiness)、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生命意义感(meaning in life)中的一种或几种，有时也包括了自尊、抑郁和其它心理症状。因此，对幸福的不同定义与测量也导致生育-幸福关系结论的不一致。

其中，生活满意度被普遍看作是基于理想和现实状况比较后的结果，属于幸福(Well-being)的认知评价成分。快乐(Happiness)的概念则可能有不同内涵，有的将其视为一种情绪状态，类似于积极情绪而非生活满意度，有的则认为它与生活满意度是相似的概念。Hansen (2012)总结认为，两者之间仅有 25%~50%的共变，应当被视为相互独立的概念实体，分别与生育有不同的关联路径。其中，生活满意度具有较大的认知成分，因此亲生子女的存在普遍会促进为人父母者的生活满意度，而不论其是否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这种效应在那些对孩子赋予极大价值的社会群体中尤其明显。相反，快乐(happiness)则对消极或积极的日常育儿体验更加敏感，也因此更容易在繁重的生育压力和责任面前表现出负面的结果。

另一方面，尽管积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呈现稳定的高相关，但生儿育女被认为更有利于促进个体的意义感而非快乐或者积极情绪(Hansen, 2012)。从概念上来说，意义感被定义为对生活的目的感和方向感，它使得个体的行为与努力在大于自己的某些概念或层面上显得有意义。纵向研究证明，向照料者身份的转换尽管付出心理健康和快乐方面的代价，但却同时促进意义感(Marks & Fleming, 1999)。养育子女过程中所包含的挑战与牺牲可能正是为人父母者的意义感提升的原因之一。如前所述，Kushlev 等人(2012)证实，金钱启动对父母陪伴孩子时的情绪体验和意义感体验作用不同。

Hansen (2012)认为，生儿育女对于促进自我实现的幸福(eudaimonic well-being)效果更大，因为这一概念包含了例如成长、发展等存在主义的概念。但相关的实证研究还很少见。Lyubomirsky 和 Boehm (2010)则认为，为人父母者在生儿育女中获得的独有的积极体验——深沉的爱、美妙而复杂的情感等——是传统纸笔测验无法测量的。幸福也并不是所有积极情绪的简单相加。生儿育女拓宽了个体生命体验的广度，其中包含了极大的积极情绪(比如骄傲的看着孩子走出人生第一步)，也可能包含极大的消极情绪(比如痛苦于孩子的痛苦)。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获得多样的情绪和体验，而不仅是积极的情绪——“深爱然后失去也好过从来没有爱过”。

4.2 社会变迁中的生育-幸福关系

近几十年以来，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日益呈现出生育率大幅下降的趋势。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越来越关注社会的发展进步对现代人生育决策以及生育-幸福关系的影响(Aassve et al., 2012)。

Lyubomirsky 和 Boehm (2010)指出，现代抚养孩子的环境与从前大不相同。从前，孩子自青春期就已开始独立出来，而现代法律要求父母必须承担抚养子女的义务到至少 18 岁。此外，从历史上来讲，抚养子女本是一项集体任务。祖先们通常是在一个大的村庄、宗族或部落的环境下抚养后代，育儿责任由所有大家庭成员甚至邻居们共同分担。而在当代普遍性的小家庭环境下，只有两人来承担抚养孩子的一切，其压力程度大增。除此之外，受教程度的广泛提升促使女性开始重视个人自由和事业的成功。对财富的关注则被证明会启动个体的能动目标(agentic goals)，它与生育相关的共生目标(communal goals)相冲突(潘哲，郭永玉，徐步霄，杨沈龙，2017)，导致个体专注于个体性的和独立性的目标，从而降低人们在生育活动中的意义感(Kushlev et al., 2012)。该结论支持幸福的比较理论。

但 Aassve 等人(2015)强调，现代人日益重视

能动目标的趋势并不一定直接影响生育−幸福的关系的发展，更重要的因素在于社会体制是否能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他们看来，这种变化就是在北欧国家所呈现出的从传统社会向平权社会(egalitarian societies)的转变。平权社会以男女在制度和社会文化上的平等为核心特征，在生育相关的方面上则具体表现为，家庭分工模式从传统的“男人养家”模式(male bread winner model)向夫妻共同负担模式(dual earner model)转变，以及对传统家务(包括照顾孩子和老人)的外包化。基于欧洲社会普调的数据分析结果间接的支持了该观点。在他们看来，面对现代人能动目标日益凸显的必然趋势，传统社会向平权社会转变与否以及转变的快慢将直接决定不同国家和地域人们生育−幸福关系的不同发展趋势。而这其中，一个社会的总体社会信任度、文化规范以及政治形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在社会信任度高、文化和宗教约束少以及水平型政治组织框架下，这种转变更容易发生。

Nauck (2014)则在结合了社会生产功能理论(Theory of Production Functions)和生育价值观点(Value of Child)的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观点提出，生育行为是人类追求总体社会福利(生理健康和社会期许)最大化的一种重要途径。具体的社会环境与条件决定了生育行为在实现这一终极功能中的效能，也影响了此文化下有关生育的主流观念与规则，最终决定了生育行为发生的概率和代际关系模式。在此观点之下，某个文化下每一个个人的体验和感受并不重要，所谓生育决策是一套暗合社会功能最大化要求的内隐机制。在这样的观点下，一些研究者已开始讨论，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在更好的追求总体社会福利的前提下，由其它活动或社会关系来替代生儿育女这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

5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生育−幸福关系是一个关乎每个个体与家庭，也关乎整个社会的复杂问题。相关理论中有的关注人类本性和基本需要，有的注重社会制度、大众观念的影响，还有的则强调个体自身特质的决定性作用。已有研究中，以宽泛的人口学调查居多，而以心理学理论为支撑的对生育−幸福关系的心理机制的探索或实证较少。已有研究结论在某些方面已得出共识，但在更多方面仍留下矛盾或未明之处。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5.1 人性哲学的深入探讨

我们非常认同 Kenrick 等人的这一看法：即只有充分认识人的本性，才能真正促进人类的幸福。生儿育女是否是人类的天性或必要的成长经历？它是一种人性的基本需要还是一个实现其它功能的工具？这种行为与关系是否可替代？

进化心理学家以基因延续为终极功能阐述了人类这一行为背后与动物相同的本能基础，并将其视为人类最高层次的基本需要。积极心理学和恐惧管理理论则强调人类相对于动物所独有的特征。比如，Peterson 和 Park (2010)坚持认为，自我实现(创造、认知好奇心、艺术)才是人类独一无二的高级需要，它可能是进化而来的，但已经完全独立出来，成为人类独有的高级需要，对这一需要的追求绝不是为了安全，为了炫耀以获得配偶或者为了生儿育女。恐惧管理理论则将人类对新生命的广泛喜爱与照顾视为对抗死亡焦虑的防御性措施之一，是具有可替代性的。当然，后两者之间仍然有极大的冲突，即生儿育女究竟是一种成长中的主动倾向，还是被动防御性的行为。Kesebir, Graham 和 Oishi (2010)则在承认“没有人能够真正意义上脱离生物性”的同时也认为，不同于动物，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受到文化的重要影响。文化会通过创造不同的环境来对人类在进化过程设定不同的优胜劣汰的选择模式，从而影响人类的基因组变化，带来人类相对于动物在生理和心理上的质变。对理智与意义感的追求才是人类最高级的基本需要；而对理智和意义感的定义则受到文化的影响。在此观点看来，自我实现或是生儿育女都只是不同文化下人获得理智感或意义感的一个选项之一。

心理学关于人类本性及其与自然、社会环境关系的探讨，应当是幸福领域研究中永恒的主题。一方面，对人性哲学的探讨将促进我们对生儿育女−幸福关系的深刻理解；另一方面，从生育行为出发，我们也可以对各种人性动机理论进行独特的比较、分析和验证。

5.2 对社会群体异质性的充分考虑

在未来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充分考虑各社会群体的异质性。事实上，所有有关生育动机的心

理学理论(包括进化心理学的理论), 都承认不同社会文化或经济条件对生育行为及其影响的制约作用。

已有的绝大多数实证结论都基于欧洲、北美的数据, 而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国情更会带来大众在生育的年龄、典型的子女数量、父母对子女的关注程度、性别角色、父母亲自养育的程度、生育动机、产假与陪护假制度以及儿童福利状况等等诸多方面的广泛差异(Nauck, 2007)。况且, 文化也会导致个体对幸福感、生活满意以及意义感的不同理解以及对情绪的不同体验和表达。因此, 我们在借鉴已有西方研究结论时要格外审慎。具体而言, 首先, 我们应当对当前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进行广泛调查, 因为它不仅反映大众的主观态度, 更将作为舆论和社会期待直接影响为人父母者以及无子女者的幸福水平。另一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要积极实施基于我国人群大样本的系统追踪调查和横向比较。目前,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等项目为此提供了可能。已有国内研究者基于这些数据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穆峥, 谢宇, 2014; 王钦池, 2015; 王伟等, 2013)。但是, 由于起步时间较晚, 测量幸福的问题单一等问题, 国内研究仍需要更长时间数据的积累以及在调查中对生育-幸福问题上的格外关注。最后, 我们还要重点考察我国特有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如孝道思想、隔代教养现象等对生育-幸福关系的影响。事实上, 在考虑到与这些因素相匹配的情况下, 我国有关生育的理想政策、制度乃至社会形态可能会与西方存在一些差异。

即便是在同一国家内, 不同人群在生育-幸福关系上的异质性也很明显。Galatzer, Mazursky, Mancini 和 Bonanno (2011)曾基于这一视角对 Clark 等人(2008)的研究所得出的消极结论进行质疑。他们使用潜变量增长混合模型对同批数据进行重新分析, 发现生育对不同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有三条完全不同的影响轨迹, 多轨迹模型比单轨模型表现出更好的数据拟合度。如前所述, 国内研究(李婷, 范文婷, 2016)也发现了生育-幸福关系的异质性现象。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强调, 以过度概括化方式来探讨研究生育-幸福关系已经缺乏意义(Galatzer-Levy et al., 2011; Nelson et al., 2014)。这提醒我们, 在进行大样本调查和分析的同时, 依据不同年龄性别、不同阶层或其它亚文化群体的特征进行更加细致和有针对性的调查实证是非常必要的。比如, 对具有较高和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进行对比研究应具有前瞻性。一方面, 女性在生和育的方面都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 基于这两类群体的对比, 我们可以更加深刻的探讨不同人类需要、自我发展以及社会进步对生育-幸福关系的影响。

5.3 基于心理学视角的实证研究

未来研究者应在已有人口学研究基础上, 以心理学的视角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虽然已有诸多心理学观点就生育行为的功能以及生育-幸福关系进行了解读, 但已有的实证研究——尤其追踪研究——更多只考虑了人口学变量或者基于较为简单甚至单一题项的测量工具完成。这导致相关研究结果零散甚至矛盾, 不好解释, 也无法为进一步的干预给予指导。未来需要更多结合基础心理学理论与严谨范式, 以探索内部心理机制为前提的研究, 对已有理论观点进行检验和发展。对生育-幸福关系中各种心理性的中介变量的研究应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而已发现的起到显著影响作用的人口学变量背后的心理原因值得进一步追究。也许未来, 生儿育女可以被进一步精确描述为一个包含了各种心理压力、体验与收益的系统概念和过程。

还需要注意的是, 幸福是一个动态多维的开放系统(黄希庭, 李继波, 刘杰, 2012)。心理学在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意义感等概念及其关系方面的研究都应当被充分纳入对生育-幸福的考察。在对幸福的评定中, 还要更多包含对自我实现的幸福、精神幸福感(徐晓波等, 2017)的测量。另一方面, 围绕生育的体验, 未来应展开更多探究。现有观点更多以类似于“实物消费”的角度探讨有或没有孩子的代价与收益, 有关体验研究也只是针对零碎的育儿活动进行表面化的排序和打分。事实上, 体验而非实体性的占有将更大程度促进个体幸福, 也与自我联系更紧密(Carter & Gilovich, 2012; Kumar, Killingsworth, & Gilovich, 2014)。并且, 在当下的体验本身之外, 体验前的期待和体验后的回忆也对个人幸福感有很大影响。如前所述, 生儿育女的体验是独一无二的, 其持续时间较长, 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

的特点，较之于其它生活事件显得更加复杂且影响深远。它混合了各种积极和消极的情绪，涉及到个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系起了个人、家庭和社会，更暗含了生与死的意义。从完整历程上来看，个体在生育之前的期待以及伴随其间的对自我的重新定位与反思，生育过程中的辩证情绪体验与角色适应以及在孩子成年独立后的思念与回味，乃至在暮年之后从后代身上获得的希望与永恒感都值得我们逐一研究。事实上，心理学家对于幸福本身的研究也远没有终结，其内涵源于人类在各种活动中的体验和反思，并可能随着人类发展而不断丰富。对生育体验的深入研究也将促进我们对幸福概念本身的理解。

5.4 干预与管理对策研究

对生育−幸福关系内在机制的探讨以及对生育行为的心理功能的研究将有助于有关心理健康服务的开展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研究者还需要更好的融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扎扎实实基于我国国情的探索性研究。

在心理健康服务方面，我们需要结合更加充分的本土化研究数据和实际案例解决至少以下一些问题：对于有生育意愿者，如何帮助其在生育时间、生育数量方面作出理性决策？对已为人父母者，如何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和对待生儿育女中所谓的收益与代价？对无子女者或失子女者，如何帮助其获得和维持有效的替代性活动与关系？

从形式上而言，以“第一接触”和长期性为特点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应当成为此方面的重点。在实践中，国外还有很多专业人员指导社区普通居民共同参与一些综合性社区项目，对居民心理健康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促进作用(徐华春，黄希庭，2007)。从另一角度而言，一些社区中已存在的好的育儿互助模式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检验并进行科学化推广。正如 Lyubomirsky 和 Boehm (2010)所言，从传统上来看，抚养子女本是“一个村庄集体的责任”。未来以科学理论为基础，以专业的社区心理服务中心为支点，重新发挥集体的作用来解决生育代价问题以及无子女老人的社会支持问题应当是一个好的途径。当然，社区心理服务在此方面的工作不能单独开展，它依赖于完整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和自上而下的专业指导和监督。

除此之外，未来研究者需要针对一些重点人群进行严谨的干预研究。基于已有调查结果，女性、年轻父母、单身父母应当是可能的重点人群；成年无子女者、失子女者中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者也应当格外关注。而在具体的干预设计上，研究者需要从基础研究中获得指导，在对生育的基本心理功能以及生育的代价机制的深刻了解基础上，针对不同亚群体发展出有针对性的、步骤明确的干预项目。事实上，基础理论与实证的研究也需要从这些干预实践中获得再验证，也势必从中获得完善与发展。

宏观上而言，个体的生育−幸福关系与国家制度、政策及舆论引导密不可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又与每个个体的生育行为息息相关。在中国，未来如何因应时代变化，调整人口政策，改革福利分配制度，提高社会信任，解决就业中的性别平等问题，才能达到个体与国家在此问题上利益的最大化，将是未来需要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多领域研究者共同努力的问题。

参考文献

黄希庭，李继波，刘杰. (2012). 城市幸福指数之思考.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8*(5), 83–91.

李婷，范文婷. (2016). 生育与主观幸福感——基于生命周期和生命历程的视角. *人口研究, 40*(5), 6–19.

陆可心，沈可汗，李虹. (2017). 恐惧管理理论中情绪的作用. *心理科学进展, 25*(1), 76–85.

穆峥，谢宇. (2014). 生育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社会学研究, 29*(6), 124–147.

潘哲，郭永玉，徐步霄，杨沈龙. (2017). 人格研究中的“能动”与“共生”及其关系. *心理科学进展, 25*(1), 99–110.

王钦池. (2015). 生育行为如何影响幸福感. *人口学刊, 37*(4), 12–24.

王伟，景红桥，张鹏. (2013). 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吗——80 后一代视角的研究. *人口研究, 37*(2), 102–112.

徐华春，黄希庭. (2007). 国外心理健康服务及其启示. *心理科学, 30*(4), 1006–1009.

徐晓波，孙超，汪凤炎. (2017). 精神幸福感：概念、测量、相关变量及干预. *心理科学进展, 25*(2), 275–289.

张茂杨，彭小凡，胡朝兵，张兴瑜. (2015). 宠物与人类的关系：心理学视角的探讨. *心理科学进展, 23*(1), 142–149.

Aassve, A., Goisis, A., & Sironi, M. (2012). Happiness and childbearing across Europ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8*, 65–86.

Aassve, A., Mencarini, L., & Sironi, M. (2015). Institutional change, happiness, and fertilit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1*(6), 749–765.

Bandura, A., Caprara, G. V., Barbaranelli, C., Regalia, C., & Scabini, E. (2011). Impact of family efficacy beliefs on quality of family functioning and satisfaction with family life. *Applied Psychology, 60,* 421–448.

Carter, T. J., & Gilovich, T. (2012). I am what I do, not what I have: The differential centrality of experiential and material purchases to the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6), 1304–1317.

Clark, A. E., Diener, E., Georgellis, Y., & Lucas, R. E. (2008). Lags and leads in life satisfaction: A test of the baseline hypothesis. *The Economic Journal, 118*(529), F222–F243.

Clark, A. E., & Georgellis, Y. (2013). Back to baseline in Britain: Adaptation in the BHPS. *Economica, 80*(319), 496–512.

Deci, E. L., & Ryan, R. M. (2008).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 macro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development, and health. *Canadian Psychology/Psychologie Canadienne, 49*, 182–185.

Delle Fave, A., & Massimini, F. (2004). Parenthood and the quality of experience in daily life: A longitudinal stud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67*, 75–106.

DeVoe, S. E., & Pfeffer, J. (2011). Time is tight: How higher economic value of time increases feelings of time pressur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6*, 665–676.

Dyrdal, G. M., & Lucas, R. E. (2013). Reaction and adaptation to the birth of a child: A couple-level analysi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9*, 749–761.

Easterlin, R. A., Morgan, R., Switek, M., & Wang, F. (2012).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25), 9775–9780.

Erikson, E. H. (1963). *Childhood &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Galatzer-Levy, I. R., Mazursky, H., Mancini, A. D., & Bonanno, G. A. (2011). What we don't expect when expecting: Evidence for heterogeneity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esponse to parenthood.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5*(3), 384–392.

Hahn-Holbrook, J., Holbrook, C., & Haselton, M. G. (2011). Parental precaution: Neurobiological means and adaptive ends.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35*, 1052–1066.

Hansen, T. (2012). Parenthood and happiness: A review of folk theories versus empirical evidenc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8*(1), 29–64.

Hartas, D. (2014). The social context of parenting: Mothers' inner resourc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Research Papers in Education, 30*(5), 609–634.

Headey, B. (2010). The set point theory of well-being has serious flaws: On the eve of a scientific revolu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7*(1), 7–21.

Kahneman, D., Krueger, A. B., Schkade, D. A., Schwarz, N., & Stone, A. A. (2004). A survey method for characterizing daily life experience: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Science, 306*(5702), 1776–1780.

Karlsen, E., Dybdahl, R., & Vittersø, J. (2006). The possible benefits of difficulty: How stress can increase and decrease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7*(5), 411–417.

Keizer, R., Dykstra, P. A., & Poortman, A.-R. (2010). Life outcomes of childless men and father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1–15.

Kenrick, D. T., & Griskevicius, V. (2015). Life history, fundamental motives, and sexual competition.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 40–44.

Kenrick, D. T., Griskevicius, V., Neuberg, S. L., & Schaller, M. (2010). Renovating the pyramid of needs: Contemporary extensions built upon ancient foundation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3), 292–314.

Kesebir, S., Graham, J., & Oishi, S. (2010). A theory of human needs should be human-centered, not animal-centered: Commentary on Kenrick et al. (2010).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3), 315–318.

Kiecolt, K. J., Blieszner, R., & Savla, J. (2011). Long-term influences of 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 on midlife paren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3*, 369–382.

Kim, P., Strathearn, L., & Swain, J. E. (2016). The maternal brain and its plasticity in humans. *Hormones and Behavior, 77*, 113–123.

Kumar, A., Killingsworth, M. A., & Gilovich, T. (2014). Waiting for merlot: Anticipatory consumption of experiential and material purchas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10), 1924–1931.

Kushlev, K., Dunn, E. W., & Ashton-James, C. (2012). Does affluence impoverish the experience of parent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6), 1381–1384.

Lucas, R. E. (2007). Adaptation and the set-point mod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Does happiness change after major life event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2), 75–79.

Luhmann, M., Hofmann, W., Eid, M., & Lucas, R. E. (2012).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adaptation to life event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 592–615.

Lyubomirsky, S., & Boehm, J. (2010). Human motives, happiness, and the puzzle of parenthood: Commentary on Kenrick et al. (2010).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3), 327–334.

Marks, G. N., & Fleming, N. (1999). Influences and consequences of well-being among Australian young people: 1980-1995.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46*(3), 301–323.

Minagawa-Kawai, Y., Matsuoka, S., Dan, I., Naoi, N., Nakamura, K., & Kojima, S. (2009). Prefrontal activation associated with social attachment: Facial-emotion recognition in mothers and infants. *Cerebral Cortex, 19*(2), 284–292.

Myrskylä, M., & Margolis, R. (2014). Happiness: Before and after the kids. *Demography, 51*(5), 1843–1866.

Nauck, B. (2007). Value of children and the framing of fertility: Results from a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survey in 10 societi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5), 615–629.

Nauck, B. (2014). Value of children and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welfare. *Demographic Research, 30*, 1793–1824.

Nelson, S. K., Kushlev, K., English, T., Dunn, E. W., & Lyubomirsky, S. (2013). In defense of parenthood: Children are associated with more joy than miser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3–10.

Nelson, S. K., Kushlev, K., & Lyubomirsky, S. (2014). The pains and pleasures of parenting: When, why, and how is parenthood associated with more or less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0*(3), 846–95.

Nomaguchi, K. M., & Milkie, M. A. (2003). Costs and rewards of children: The effects of becoming a parent on adults' liv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5*(2), 356–374.

Parsons, C. E., Young, K. S., Murray, L., Stein, A., & Kringelbach, M. L. (2010). The functional neuroanatomy of the evolving parent–infant relationship. *Progress in Neurobiology, 91*(3), 220–241.

Plagnol, A. C., & Easterlin, R. A. (2008). Aspirations, attainments, and satisfaction: Life cycle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women and me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9*(4), 601–619.

Peterson, C., & Park, N. (2010). What happened to self-actualization? Commentary on Kenrick et al. (2010).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3), 320–322.

Pollmann-Schult, M. (2014). Parenthood and life satisfaction: Why don't children make people happ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6*(2), 319–336.

Schaller, M., Neuberg, S. L., Griskevicius, V., & Kenrick, D. T. (2010). Pyramid power: A reply to commentarie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3), 335–337.

Strathearn, L., Fonagy, P., Amico, J., & Montague, P. R., (2009). Adult attachment predicts maternal brain and oxytocin response to infant cues.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34*(13), 2655–2666.

Wenger, G. C., Dykstra, P. A., Melkas, T., & Knipscheer, K. C. P. M. (2007). Social embeddedness and late-life parenthood - Community activity, close ties, and support network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8*(11), 1419–1456.

Wisman, A., & Goldenberg, J. L. (2005). From the grave to the cradle: Evidence that mortality salience engenders a desire for offspr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9*(1), 46–61.

Zhou, X. Y., Lei, Q. J., Marley, S. C., & Chen, J. S. (2009). Existential function of babies: Babies as a buffer of death-related anxiety.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 40–46.

Zhou, X. Y., Liu, J., Chen, C. C., & Yu, Z. H. (2008). Do children transcend dea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terror management function of offspring.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9*(5), 413–418.

Does parenthood increase well-being?

XU Huachun; CUI Biying; ZHANG Wenting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hood and well-being is an important topic which concerns the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the society as a whole. Now, it has become a hot research area in psychology and involves many factors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uch as the basic human needs,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and different growing environments. Regarding this issue, comm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have some shared beliefs,while psychologists have different views.To date, empirical research that has focused on the well-being of parents has reported inconsistent results which may be explained by different definitions and measures of well-being used, and a variety of factors that may moderat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hood and well-being. Further, as society changes due to for example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values, this relationship and the moderating variables may have changed over time.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research in this area and the theories that have been used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hood and well-being.Future research should aim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people, and do more empirical studies from the view of psychology.Such research has the potential to inform both mental health service provision and family-related policy.

Key words: parenthood; well-being; happiness; life-satisfaction; meaning